

多省文物重現唐蕃古道

吐蕃金銀器喚響絲路駝鈴

唐三彩陶馬、青釉牽馬瓷俑、石雕胡人像、鑿刻團窠飛馬紋飾片、吐蕃文大般若經……在四川博物院舉行的「天路長歌——唐蕃古道沿線七省區精品文物聯展」，遴選了來自青海、甘肅、陝西、寧夏、新疆、西藏、四川的189件/套精品文物，一展唐蕃古道對漢藏文化交流的特殊價值及其對沿線地區的重要意義。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唐蕃古道路線圖

青海省博物館藏的(唐)玉臥馬

遼源古道博物館藏的(唐)銀包金鑿刻龍紋飾片

遼源古道博物館藏的(唐)鑿刻團窠飛馬紋飾片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的(唐)彩繪泥塑打馬球俑

作為陸上絲綢之路南道路網的重要組成部分，全長3000餘公里的唐蕃古道，亦稱唐蕃驛道，跨越今陝西、甘肅、青海、四川、西藏等省(區)。這條路是公元7至9世紀唐王朝國都長安(今陝西西安)與吐蕃都城邏些(今西藏拉薩)之間的官道，並向南延伸至尼泊爾、印度地區。唐蕃雙方通過政治聯姻、使團往來、經濟貿易及文化風俗的彼此影響，使其成為民族交往、文化交流、貿易往來、維繫民族情感與區域聯繫的紐帶。

見證漢藏友好發展

據統計，自唐初吐蕃首次遣使入唐，至9世紀中葉吐蕃滅亡，在200多年的時間裏，唐蕃雙方使臣往來近200次，行走在古道上的使臣、商人、僧侶、軍隊等，都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漢藏關係的友好發展。

事實上，中原與青藏高原的交往，唐前就有跡可循。青藏高原作為中華民族與文化的發祥地之一，遠古時代便有族群在此活動。新石器時代，隨着遠古人類遷徙活動，在黃河流域傳播了以彩陶為標誌的史前文明，開拓了本地區早期道路。先秦時期，生活於甘肅、青海一帶的羌人，拓展了與周邊地區的聯繫，形成「湟中道」「羌中道」等多條西北地區古代交通幹線。

而漢王朝在關中至青海東部一線，沿途修建了用於軍事活動的驛站郵亭，其中一部分發展為城鎮，所形成的道路就具有了官道的性質。魏晉時期，原居於遼東一帶的鮮卑慕容部，移牧到青海地區後建立吐谷渾政權，進一步推動了青海與內地的交通發展。隋煬帝西巡，則為後來唐蕃古道東段的開通，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金銀器技藝精良

公元7世紀初，松贊干布定都邏些，建立吐蕃王朝，並於貞觀八年(公元634年)遣使長安，從此拉開了唐蕃關係的序幕。隨着唐和吐蕃建立起密切關係，唐蕃古道最終形成，並呈現出「金玉綺繡，問遺往來，道路相望，歡好不絕」的興盛景象。

隨着唐蕃古道的開通，唐蕃之間經濟往來密切，物資貿易頻繁。同時，唐蕃古道一直延伸至南亞次大陸，形成了通往印度的天竺道、通往尼泊爾的泥婆羅道，將中國西部與南亞地區連接在一起，承載了東西方商品貿易、文化傳播的重要功能。

此次展出的189件/套精品文物，包括了金銀器、絲織品、佛像、抄經、民間用品

等多個門類，其中的金銀器尤為精美且獨具特色。

美國學者謝弗曾在其著作《撒馬爾罕的金桃》中讚歎道：「吐蕃的金器以其美觀、珍奇以及精良的工藝著稱於世，在吐蕃獻給唐朝的土貢和禮品的有關記載中，一次又一次地列舉了吐蕃的大型金製品。吐蕃的金飾工藝是中世紀的一大奇蹟」。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博物館館長霍巍教授表示，在中國的史書文獻中，也有很多關於吐蕃金銀器的記載。如唐代顯慶二年(657年)吐蕃贊普遣使節向唐王朝貢獻了一座金城，城上立有獅子、大象、駱駝、馬等動物，動物之上還有騎手。到唐開元二十四年(736年)，吐蕃再次遣使向唐王朝貢獻方物，這次獻上的貢品當中有金銀器玩數百件之多，「皆形制奇異」，唐朝皇帝為了讓百官群僚都能夠觀賞到這些來自高原的珍奇異寶，特指令將這些金銀珍寶都陳列於都城的提象門外，「以示百僚」。

「唐朝皇帝什麼都見過，但是吐蕃金銀器打動了他，要專門做一個特展。」霍巍表示，此次展覽中，以實物形態保存至今的吐蕃金銀器，向觀眾展示了它們如文獻記載那樣精彩動人的形態。

如遼源古道博物館藏的銀包金鑿刻龍紋飾片、鑿刻飛馬銀紋飾片、鑿刻團窠飛馬紋飾片、聯珠紋鑿刻飛馬紋飾片及鳥獸紋鑿金馬鞍飾片，就體現了吐蕃金銀器製作水平的高超。其中，用黃金捶拓、剪切而成的幾個金銀飾片都很輕薄，展示了吐蕃人心目中的龍和天馬的形象。而鳥獸紋鑿金馬鞍飾片則是吐蕃馬具，整個用黃金飾片來製作的，上面還留有鑲嵌紅寶石的痕跡。

同時，甘肅省博物館藏的花葉紋金帶飾、青海省博物館藏的鏤空花瓣金飾片、金花飾片，遼源古道博物館藏的卷草紋鏤空金帶飾、鏤綠松石金馬飾片、龍紋金扣飾、雙獅紋金飾片、鑿刻寶相花紋金飾片等，則可能是吐蕃服裝上的裝飾，並通過不同的材質，顯示其不同等級。

蜀地與古道聯繫緊密

唐蕃古道上經濟貿易的繁榮，使漢藏兩族間的文化交流不斷深入。雙方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通過唐蕃古道互相影響及傳播，其內容主要反映在文化思想、科學技術與民族風俗等方面。

絲織品是此次展覽中的另一大重要門類。遼源古道博物館藏的龍紋織錦、黃地中窠梅花鹿紋織錦，青海省博物館藏的黃地聯珠小窠菱花錦、紫地黃綠色花卉紋



四川博物院館藏的(唐)青釉牽馬瓷俑和(唐)青釉駱駝瓷俑



遼源古道博物館藏的(唐)龍紋織錦

「吉」字錦覆面等，都顯示了唐蕃兩地的交流。

霍巍認為，由於高原自然、氣候條件所限，無法提供絲的原料，吐蕃人始終沒有學會種植蠶桑、製作絲綢，主要是通過饋贈、貿易或戰爭手段等獲得。「吐蕃的絲織品最重要的特徵是採用了聯珠團窠紋樣，這些紋樣在蜀地有很深的印記，說明當時蜀地是這些外銷產品的重要基地。」

霍巍說，展覽中的黃地聯珠團窠對馬錦、黃底花瓣團窠對含綏鳥紋錦等，都是當時「絲綢之路」沿線流行的圖案，反映出一個時代的審美意趣和流行風尚。而從地緣上講，成都都是通往藏區如青海、西藏等地最便捷的地方，不必從更遙遠的地方轉輸貿易。同時，蜀地有悠久的桑蠶養殖歷史，也有悠久的絲綢製作、販運、銷售歷史，因此「高原絲綢之路」中的絲綢源頭絕大部分來自當時的益州(今成都)。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在四川博物院的展覽，在原有巡展內容的基礎上新增了四川吐蕃遺蹟，如四川石渠縣吐蕃石刻群、四川爐霍呷拉宗吐蕃墓等。

其中，四川石渠縣吐蕃石刻群保存狀況良好、題材豐富，有藏傳佛教的五方佛、大日如來像、菩薩像、度母像，也有反映吐蕃宗教情況的古藏文題記。經過專家考證，古藏文題記中明確記載了石像雕刻於吐蕃贊普赤德贊時期，是研究吐蕃佛教文化的重要資料。這一石刻群的發現，以實物印證了史書中所提到的在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的(唐)彩繪陶胡人俑

「高原絲綢之路」搭建民族溝通橋樑

在題為「天路聚珍 唐蕃古道上的金銀器和絲織品」的專題講座上，霍巍從金銀器和絲織品兩個角度，闡述了「高原絲綢之路」這一概念。在他看來，吐蕃雖然地處高原，但並不是個孤島，而是連通了北方絲綢之路和南方絲綢之路，呈現出多元性。

霍巍表示，中國國家文物局2017年在西安首次公布的一張絲綢之路地圖上，就加入了「高原絲綢之路」的路線。各門類的文物都顯示出這個高原王國與外部世界之間緊密的聯繫，用事實證明橫貫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當中，由高原各部族所創立並在吐蕃王朝時期達到鼎盛的「高原絲綢之路」，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高原絲綢之路』與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有機結合，使如今的『一帶一路』成為一個整體。」霍巍說，「高原絲綢之路」不是簡單的某一條路線，而是一個路網，在不同歷史時期發揮着交通運輸、政令通達、商貿往來、文化交流等重要功能，更架起了各民族之間溝通的橋樑，增強了中華民族「一家親」的認同感，維繫着國防安全與社會穩定。



青海省海西州民族博物館藏的(唐)黃底花瓣團窠對含綏鳥紋錦

甘肅省博物館藏的(唐)吐蕃文大般若經



青海省博物館藏的(唐)唐三彩陶馬



四川博物院館藏的(清)慧通禪師印、「錦斯甲布宣撫司」銅印、「卓克基長官司」銅印(從左至右)

記者手記